



□ 张子琰 张晓彤

德国汉学家顾彬： 主持翻译德文版《鲁迅选集》

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德国诗人、作家、汉学家、翻译家，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思想史。顾彬编写中国文学史、译介中国诗歌成果颇丰，以德文、英文、中文出版专著、译著和编著达50多部，培养了一批文学翻译工作者、外交家和汉学家，为中国文学研究与传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一）

1945年，顾彬出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策勒市。这一年，纳粹德国向反法西斯同盟国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结束。彼时，德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因战争遭到巨大打击，国家进入极度困难时期。顾彬的童年物资匮乏、生活艰难。同时，德国战后即二战历史的反思影响着顾彬的历史观念和思维方式，使得他在日后的学术研究中更多从历史的传承和社会的发展角度研究问题。

1966年至1968年，顾彬进入明斯特大学学习神学。神学解决不了“人生的意义”问题，也使顾彬时常感到迷茫。在这一时期，偶然读到的一首中国诗歌使顾彬与研究中国结缘。与大部分西方诗歌中直抒胸臆的写作手法不同，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诗中优美的语言和悠远的意境深深打动了顾彬，为他打开了文学创作新的视野。1968年，顾彬转入维也纳大学，开始学习古汉语和日本学。中国文学中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和对人的道德、情感、主观能动性的关注，激发了他对中国文学的独特兴趣和热爱，让他对“人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人”有了更多体悟。

1972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在短期内互派大使，建交后，双方开展了一系列友好往来，相互了解和认知不断增进。得益于此，1974年，顾彬获得了为期一年在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的机会。怀

着对古老而神秘的中国的好奇之心，顾彬在北京城欣赏山水，追寻历史。他几乎每天都会去圆明园，在废墟中阅读、思考，思索历史给当代人留下了什么。在课堂上，顾彬第一次知道了鲁迅。鲁迅作品中流畅的语言表达和蕴含的深刻思想吸引顾彬反复阅读、揣摩文本，还尝试编写了一本名为《鲁迅诗歌、散文、小说杂文选》的小册子，这也为日后主持翻译六卷本德文版《鲁迅选集》的庞大工程奠定基础。

20世纪80年代中期，汉学在欧洲的影响力开始上升，也吸引了很多学生学习中文。回到德国后，顾彬先后在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系、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任教，长期担任《袖珍汉学》《东方向》杂志主编。在学生热情高涨的时候，他将学生分为四组上课，一周课时量达到16小时，超过规定的8小时一倍。完成了六卷本德文版《鲁迅选集》的翻译工作后，顾彬主持编写十卷本德文版《中国文学史》，并主笔《中国诗歌史——从起始到皇朝的终结》《中国古典散文》《中国传统戏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这套丛书的索引分类颇有特色，也成为日后人们学习中国文学的一套指南书籍。自2010年起，顾彬开始撰写、翻译十卷本德文版《中国古代思想家丛书》，《论语》《老子》《孟子》《庄子》等先后在德国出版，他也因此获得德国最高翻译奖项——约翰·海因里希·沃斯奖。顾彬还将北岛、顾城、杨炼等新诗人引入到德国，为汉学的传播、汉学人才的培养和文化交流对话作出了卓越贡献。

（二）

神学、日耳曼文学和哲学，德语、拉丁语和汉语，诗人、翻译家和汉学家……顾彬拥有的多元学科背景和多重身份构成了他从事研究的重要支撑，从宗教、哲学、历史等多角度研究中国文学，是顾彬学术研究的特点。在顾彬出生和成长的时代，德国汉学科正经历恢复和重建。在当时德国乃至欧洲的汉

学研究中，普遍通过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寻找“共性”问题。顾彬所属的波恩学派反对将欧洲的价值标准作为统一的衡量尺度，更加突出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的特质，更多聚焦中西文学、历史和哲学差异碰撞、交融后的理性思辨。在顾彬的研究中，他对在汉学研究中的“求异”而非“趋同”的研究方式的继承和发展，为认识中国提供了另一个视角。例如，顾彬试图探寻中国诗歌的“起源”与“本质”，从“偶然性”“等待”“记忆”等哲学概念解析唐诗的意境，比对汉语言文学中的“怨、愁、悲、哀”情绪和西方文学中的“忧郁”主题，分析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学的语言、思想价值和社会影响。顾彬认为学术应该像艺术一样具有创造性，因此，他对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观点持有非常开放包容的态度，且一直以来都在不断地回望、修正自己的研究成果。

德国有重视翻译文学的传统，许多中国文学作品的传播得益于顾彬的翻译。在大量的实践中，顾彬形成了自己的翻译风格。顾彬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注解，是一种交流行为。原文文本不再属于作者，译者可以在合乎逻辑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理解和阐释。翻译没有标准答案，译文只是提供了理解作品的一种可能性。在翻译中，译者应当根据上下文语境考证多音字、多义词的解释，尽可能准确地传达文本的含义和原文的文学性。同时，将文本置于作家和读者所处的历史背景中思考。译者和作家的自我修养在于忠于道德水准、忠于自己的洞察力和忠于对语言的熟练掌握，而不是机械地逐字逐句还原文本。

（三）

顾彬一直非常关注汉语言文学如何成为“世界文学”的问题，即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顾彬所认同的“世界文学”是超越了民族特性，被世界广泛理解与接受的文学，呈现的是各民族文学在交流互鉴中绽放独特魅力，成为人类宝贵

的共同财产的美好愿景。

顾彬指出，中国文学传播中最基础的“他因”在于所在国家对汉学的兴趣、图书市场和传播媒介。以德国为例，《道德经》之所以在德国拥有很高的知名度，不仅是因为它的翻译非常成功，更因为德国对中国古代哲学超乎寻常的兴趣。顾彬列举了一些可以被称为“世界文学”的中国作品——《楚辞》《牡丹亭》，以及苏东坡、萧红、张爱玲、北岛、林语堂的作品等。他认为，这些作品在国外的成功大多得益于其中包含的全人类共同的认知体验、对社会的批判描写，或是女性视角的书写。

诚然，一个国家文化的“走出去”离不开优秀学者、翻译家的推动，更重要的是要拥有优秀的作品。作为诗人和作家，顾彬对文学创作有更深刻的体会，他认为，好的文学也是好的哲学，文学创作必须兼顾语言的文学性、思想深度和写作的创新探索。这也是他对鲁迅推崇备至的原因——鲁迅的作品不仅在思想和艺术上达到了很高境界，还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创新和引领作用。

顾彬对待文学的态度纯粹而清醒。他曾表示十分认同法国诗人马拉美的观点：如果想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或诗人，必须保持20年的缄默。如果20年后再把作品拿出来翻阅，仍觉得写得好，那才可以出版。而在现实生活中，顾彬等待、沉淀了30年，才开始出版自己的诗集。他也多番公开批评过一些追名逐利、盲目迎合市场的文学创作。他对作品的翻译推介出于纯粹的热爱和责任，他愿意自行支付书籍出版的费用，在当今社会，这种态度显得尤为可贵。



自古以来，无数商人为了通商不畏艰险奔波于印度洋各地，印度洋逐渐成为一条贸易坦途。古代中国与印度洋贸易交往历史悠久、丰富多彩，大量中国与异域商人沟通了中国与印度洋诸地交往，共塑了印度洋诸地文明友好交往、交流与交融的历史场景。

（一）

历史上中国很早就重视与印度洋诸地国家交往。汉代，汉使就曾航行至印度等地，印度等地商人亦曾常向汉朝贡献各类奇珍异宝。东南亚诸地与中国贸易联系更为密切，如掸国（今缅甸）等国商人常来中国贸易、献贡。来自罗马帝国的商人使节甚至也经印度洋入华贸易，显示中国与印度洋诸地贸易联系范围之广。

隋唐时期，中国与印度洋诸地的贸易交往更加紧密。隋炀帝继位不久，为志求珍异便派遣常骏等出使赤土（今马来半岛附近）。唐代印度洋交通较前为盛，尤其在安史之乱之后海路交通取代陆路交通，成为中国与异域交往的主要通道。唐代非常重视海外贸易，于显庆六年（661年）颁布《定夷舶市物例敕》以管理海外贸易；玄宗年间，印度洋海外诸国来华通商者甚多，其中云集在广州的印度、波斯与马来亚等地的海舶不计其数，物资积载如山，唐廷在广州专设“市舶使”以监督贸易、征收关税，对海外贸易的管理日渐重视与规范。

宋元时期，中国海外贸易进入高峰时期，海外贸易所获资财已成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中原王朝对印度洋贸易极为重视，先后在广州、泉州、杭州、明州等地置市舶司，制定完备的市舶管理制度，专管海上贸易，举行祈风、祭海等仪式欢迎异域蕃商来华贸易，积极鼓励中国商人出海贸易。此时，大量中国商人积极进入印度洋各地经营贸易，贸易范围与规模较之前代不断扩大，中国海舶经常航行至红海、波斯湾、东非等遥远的印度洋西部海域。

明代初期积极遣使海外，大力推动海外贸易，通过海路同东南亚、印度、阿拉伯，乃至非洲等地区国家进行频繁的贸易往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古代印度洋贸易体系。明成祖时，多次派遣使前往海外拓展海上贸易，并开启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壮举，有力促进古代中国与印度洋地区各国的海上贸易往来。

直到近代以来，西方诸国在印度洋地区的经略使得古代传统贸易体系逐渐消解，被西方殖民贸易与垄断贸易所取代，传统的古代印度洋贸易让位于西方的全球性贸易。

（二）

古代中国在印度洋长途贸易中最为重要的贸易对象为波斯与阿拉伯地区。3世纪萨珊波斯取代安息，成为波斯湾地区的新主人。波斯人扼守横贯其境的海路与陆路交通，通过垄断过境的贸易物资牟取高额利润，成为印度洋贸易的主导群体。7世纪之后则以阿拉伯帝国为主，阿拉伯商人足迹几乎遍布印度洋各地，贩卖珍珠、象牙、犀角、乳香、龙涎、木香、丁香、安息香等阿拉伯特产。

早在唐代，阿拉伯商人就来到广州经营贸易。9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曾至印度、中国贸易，记载了从波斯湾通往中国的海路，整个航程总计历时4个多月，即可在西南季风期间完成从波斯湾到中国航行的航行。10世纪初，阿拉伯著名史地学家马苏第周游各地，先后到达东非、印度、锡兰、爪哇，乃至中国沿海等地，并著《黄金草原》一书。马苏第在书中亦记载了从波斯湾通中国的海路，同时提及中国船只直航至阿曼、西拉夫、巴士拉等阿拉伯帝国等地。唐代贾耽在“广州通海夷道”中亦早已记载了从广州通往阿拉伯的海上交通，与苏莱曼、马苏第所记从波斯湾通中国海道相同，宋人周去非、赵汝适分别在《岭外代答》、《诸蕃志》中对此海路也有所记载。宋元时期，随着中国造船技术的提高及指南针的使用，中国海舶远洋航行能力迅速提高，大量中国海舶驶往阿拉伯地区贸易。元代阿拉伯人史地学家阿布肥达在《地理志》中就提到中国的海舶经常停驻在阿曼等地。

印度与东南亚等地也是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重要贸易对象。中国与印度交往历史悠久。汉时，中国船只便可至印度西海岸地区。宋元时期，中国与印度贸易交往颇为频繁。印度马拉巴地区（西海岸）等地商人满载当地及从阿拉伯等地贾贩而来的贸易物资，经东南亚，即可到达广州、泉州等地。元代著名旅行家与商人马可·波罗就曾提到泉州贸易商船的数量以印度马拉巴之地

古代中国与印度洋贸易： 见证文明互动交融

□ 黄冬秀 李大伟

为多，印度商舶所载宝石珍珠数目之多令人惊叹。此时，中国商人亦多前往印度贸易。元代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就曾提到印度西海岸等地有大量定居的中国商人。

古代中国与东南亚诸地贸易联系也非常密切。唐代之前，中国商人经常从马来亚手中获得印度洋各地物资。宋元时期，大量中国商人进入印度、东南亚等地经营贸易，中国巨大的海舶取代其他商舶成为东印度地区商人主要的海路交通工具。此时，中国商人源源不断地涌入东南亚各地经营贸易，如占城、真腊、三佛齐、阇婆、渤尼、菲律宾等地。宋元时期，在东南亚正南诸国之中，以三佛齐为都会；东南诸国中，以阇婆为都会。另外，渤尼因其物产及交通便利也成为贸易商人多往之地，因此彼时广州、泉州等地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多集中于这三个地区。

（三）

在悠久的印度洋贸易历史中，印度洋各地无数商旅搭乘着海舶游走在中国与沿线各地之间，沟通了印度洋诸地的商贸往来，共同谱写了古代海上贸易交往的壮丽场景。在古代中国与印度洋贸易交往中，许多贸易商旅的经典故事以及历史记载流传至今，成为古代印度洋文明交往的历史见证。

其中一些商人不仅经印度洋入华贸易，而且据其亲身见闻记载了当时中国与印度洋的贸易状况，如苏莱曼曾入华贸易并著《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了唐代经波斯湾等地入华贸易的盛况；马可·波罗亦据其入华贸易经历详细，记载了彼时印度洋贸易以及中国的情况。

同时，古代众多中外历史学家、地理学家以及博物学者根据印度洋商旅的贸易信息与见闻，详备了古代中国与印度洋地区的交往与贸易状况，印度洋沿线各地地理、风俗、奇闻异事等。诸如9世纪阿拉伯史地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阿布肥达《地理志》以及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元人汪大渊《岛夷志略》等等，不胜枚举。

无论是商人的亲历记载，还是中外历史学家、地理学家与博物学者间接所获的相关信息，这些知识遗存为了解古代中国与印度洋诸地交往，以及印度洋文明交往、交流与交融，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因此，除了贸易物资流通之外，古代中国与印度洋的贸易交往历史还为我们留下了见证人类文明互动交流的文化遗产，丰富了文明交往、交流与交融的内涵与特征。



（上接1版）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强调文化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坚守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强调关注意识形态领域安全问题、网络意识形态问题，关注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进问题，关注加强和改进思政课等问题。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主张用辩证系统的观点认识和处理文化发展中主要矛盾和重大关系问题。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主张以世界眼光去观察当今时代，了解文化态势，尊重文明差异，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进程，第一次揭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明确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相互支撑。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的突出特性。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

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要创新传统文化。以现代化实践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世界文明发展的新成果，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部分。它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在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过程中，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丰富人的精神世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任务，创造性地提出并深入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价值观念体系，指明了文化建设的方向 and 任务。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价值观建设。从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列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重要内容，再到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价值观念体系。这个体系概括来说，就是以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根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为主要内容，以全人类共

同价值理念为拓展内容。核心价值观念既关个人之道德，又乃民族之大德，不仅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也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地从中国特社会主义文化中提炼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精神内核，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工作的重点，发挥核心价值观念在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之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决定了文化建设的主要方向和基本任务。文化建设的基本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一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二是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用